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路在何方？¹

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1995年，林毅夫教授就曾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贺〈经济研究〉创刊四十周年》一文中，系统阐述过这一问题。十多年来，随着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应用程度的不断加深，海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国内经济学者、留美学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多次讨论，《经济学家茶座》也刊登过大量的相关文章。

今天，这一问题又引起了大洋彼岸的一位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 John Whalley 教授的注意。John Whalley 教授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开创者，在国际贸易、可计算一般均衡、公共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研究领域享有盛誉。近年来，John Whalley 教授十分关注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经济研究，这篇文章最初就是源于他与在其政策模拟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之间的一次日常学术讨论。当一些国内学者看到这次讨论的记录稿后，均建议将其发表出来，以期引起国内的经济学者和学生的再次关注。John Whalley 教授担心自己对中国的经济研究现状理解不全面，建议请更多的中国学者参与到其中来。下面是我应邀写下的评论、补充。

田国强：

当前，中国经济学科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这与 20 世纪 40-50 年代现代经济学在美国初期发展时的状况有些类似。对于现代经济学，国内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第一种是基本否定现代经济学的作用；第二种是泛用模型，即不考虑由中国实际情况与经济制度环境所决定的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将一个经济理论或模型泛用到中国现实问题，简单地套用，而不管这个理论模型的假设与中国的经济现实和制度环境是多么的脱节。

John Whalley 教授在他的谈话中重点强调了第二个问题，即泛用模型问题。对于此问题，我同意 John Whalley 教授及参加本次讨论的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想强调的是，在重视上述第二种倾向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另外一种倾向，即否认现代经济学的作用。消除这种倾向也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完全否认现代经济学的作用可以说是犯了方向性错误。现代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下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一门学科，有着一整套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并发展出了许多分析工具。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取向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从而掌握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泛用模型则是方式和技术问题（当然也会造成很多，甚至是非常大的问题和失误），但大方向是对的。就像小孩学大人讲话做事，尽管不是这么一回事，或像年轻人做事还不熟练，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越做越好，没有太多担心的

¹ 全文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大洋两岸的对话》，将于 2009 年 3 月 1 日中、英文同步发表，中文版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三十九辑 2009.1，英文版发表于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CIGI）网站<http://www.cigionline.org/>。

必要；就像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一样，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存在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解决的，但改革方向一旦错了，一切都没有戏了。所以，我们应该防止那些用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性来完全否定现代经济学作用的倾向。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分析原理、研究方法所提供的许多分析工具是无地域和国界之分的，可以用来研究不同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当然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经济制度环境下的各种经济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中，我详细的阐述了这一问题。所以说，对于青年学者和学生而言，无论是做纯理论的研究，还是做中国问题的研究，首先要掌握好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理论和分析工具，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将其本土化，并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真正对中国经济及其体制转型做出了让人信服的研究的经济学家，正是那些真正掌握和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和原理的人。

其次，我想谈谈如何看待某些经济理论结果与现实脱节的问题。由于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研究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些经济现象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往往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即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是相对完善的。尽管这些理论不适宜直接描述当前中国经济制度环境，但是却从不同的角度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取向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努力的目标。这样，许多现代经济学理论也就为我们研究各种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的参照系和基准点（benchmark），让我们知道了努力的方向，以及现实和理想状态之间的落差。从而，我们在研究偏离了理想状态的现实问题（如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时，需要对所提供了参照系和基准点的经济理论进行适当的修正，并与之进行比较，大多现代经济学理论也都是如此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不少人正是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没有很好地理解，从而导致了认识上的误区。

由于上述原因，一个一般的经济理论往往会与某国、某地的现实脱节，但在应用上，则必须让所应用的理论尽可能接近现实，或发展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或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否则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后面还会谈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在人们思想水平不高，大多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采用市场经济制度来协调经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那么，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在这一前提下，我们首先要弄清各类改革的子目标和结果应该是什么。但要注意的是，目标不等于实施过程。提出目标是回答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实施过程则是回答怎样做才可以达到所提出目标的问题，也就是需要弄清楚如何改革和怎样实施的问题。这首先需要充分考虑到可行性、可操作性，也就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即在各种约束条件下给出（过渡性）制度安排，这也符合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在约束条件下，进行取舍和选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在解决现实问题时，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而，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就需要对提供参照系和基准点的现有理论进行修正。但不管怎样，分析问题的框架和研究方法都是一样的，并且不少分析工具（如：供给需求基本模型、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都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现象。现在还有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青年学者和学生对这个问题总是感到迷惑，一个原因就是现代经济学缺乏良好的训练，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改变这种现象。

再其次，在解决经济问题时，我们不可能拿社会做实验，因而在做现实问题研究，应

^{*}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年2期。

用某个经济理论提出政策性建议时，需要非常慎重，注重理论结果成立的前提条件，因为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适用范围，即边界（先决）条件的。只有将经济现实环境充分地把握住，才会通过经济理论（也许需要发展针对相应问题的新经济理论）得出符合逻辑而又切合实际的结论。只有对所涉及到的经济学基本理论有一个较好的掌握，充分注重或弄清楚所应用的经济理论结果成立的前提条件（具有良好技术性训练的海归在这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因而从某种程度来讲，对中国问题把握较好的本土学者与海归学者合作进行研究，也许会产出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确保所提出的经济政策应对得当。否则，一个政策建议不当，会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后果。比如，这次美国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政府的官员和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忽视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简单的先决条件，即忽视了金融行业的巨大外部性（传递性），放松了金融监管，导致机会主义者疯狂逐利，从而使得市场泡沫不断膨胀直至破裂。

再比如，国内对于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把握和应对就很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为什么在去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所采用的宏观调控政策完全相反？并且正反两方面政策力度均是如此之大？这说明在理论指导方面还存在较大欠缺。在判断经济形势和预测经济景气这类政策性研究时，不能够只看重经济数据。数据在许多情况下对短期预测和检验理论当然有用。但经济数据在有些方面，如在预测经济景气的情况下，可能有它的局限性。那么，一个政策怎样才能具有前瞻性呢？靠什么来让我们得出事前的结论呢？这就是经济理论的逻辑技术分析。也就是说，只要将经济现实环境充分地把握住，就会通过经济理论得出逻辑的结论。例如，我和曾担任过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的黄晓东教授早在去年6月份写的《治理通货膨胀，更要警惕经济大幅下滑风险——关于解决扩大内需和抑制通货膨胀两难的政策建议》一文中，通过经济环境所具有的三大成因，得出了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正不断累积这一结论，提出了“慎紧缩、稳股市、拉两头、控中间、停升值、缓提价”等六大综合治理措施。以上两个例子都说明了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重要性。因此，加强基本理论的训练和分析工具的掌握，就显得非常必要。不仅如此，我们也应该有一大批中国学者瞄准国际研究前沿，在理论创新和提供分析工具研究做出贡献，在具有共性的研究方面具有话语权。只有这样，中国学者才能受到国际同行的尊重，研究的成果才会得到别人的重视。

下面，我想谈谈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以及中国青年学者的国际化道路的探索的问题。

过去十年多来，国内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内的期刊如《经济研究》在引导国内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上面刊登的文章大多写的比较规范，很多都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不过，与国际研究水平相比，国内的经济学研究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如果我们将国际刊物和国内刊物发表文章的归类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纯理论的创新，具有共性的基本理论研究，这些理论结果没有国界，具有一般性，如博弈论、信息不对称时的委托代理和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在这方面，中国的研究水平和国际相比差距很大，这些差距体现在原创性、发表论文数量的差别、研究方法、以及文章中体现的经济思想的差距。很多技术性很强的文章，其实也可能在其中包含很多经济思想，模型背后体现的是深刻的经济学思想（如一般均衡理论、信息经济学、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第二类是现实问题的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来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研究本国问题当然占大多数，而研究国外问题占少部分。而中国经济学期刊基本只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等。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学者有着独

特的优势，虽然有很多国外的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很感兴趣，但是他们研究中国问题时没有优势，我没有看到外国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有过什么像样的研究。

其次，国际刊物和国内刊物在选择稿件时的偏好（也许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也是有所不同的。国内的刊物侧重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不太注重（也可能是由于对现代经济前沿了解不够，很难做出）现代经济学纯理论方面的创新性研究。国际期刊以美国经济刊物为例，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最注重的是一般性理论问题的研究，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信息不对称时的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组织理论、产权理论、或针对某个经济现象给出理论解释等。也有一些是为建立参照系和基准点而发展出来的理论，这些理论假定比较理想的经济环境，如信息完备，零交易成本或市场经济制度规范，离现实较远；其次是对美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第三方面是对他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如中国经济问题。我们看到有一些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如钱颖一等都作出了很不错的研究成果。一些国际刊物，如《China Economic Review》等也非常关注中国经济问题。

关于中国青年学者的国际化问题。我认为对于本土学者来说，首先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的学习和掌握，其次要发挥自己对中国经济具有较好把握和了解的优势。此外，应该有开放的心态，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国际化拓展，如既可以和国外学者合作，也可以和海归学者合作，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质量，实现双赢。对于海归学者而言，在国内和国外的工作环境相比，国内工作带给他们的优势，就是身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大环境中，对中国现状比较了解，所以做中国经济问题有比较优势。不过，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海外学子毕业回国后就立刻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现实，老一辈经济学者有很好的把握，很多海归青年学者虽然接受了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但由于对中国现实把握不够及认识不深，回国后立刻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只是进入经济学研究这一终身事业的门槛，初出茅庐的海归博士往往对中国现实问题把握不足，对经济理论的训练和掌握也不够，不太可能提出深邃的经济思想，做不出什么高质量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并且，由于名气不够，即使做出了较好的研究也不大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不利于个人学术生涯的发展。我个人是做纯理论研究的，直到拿到终身教职几年后才开始做中国问题研究。我看到不少刚毕业时非常优秀的青年经济学者由于没有将内功练好（理论功力及把握现实的能力不足），就立即进行中国问题研究，往往没有什么后劲，加上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的迅速上升，新人辈出，让人感觉这些人所做的研究越来越差。

总之，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在国内做研究的优势就是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具有切身和相对深刻的认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具有近水楼台之便。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界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时，为了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及其成果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掌握经济学研究的话语权，我们也需要有相当一批人瞄准国际前沿，做纯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不单单是做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所有这些，都需要青年学者学好现代经济学，掌握其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注重培养自我学习，知识自我更新的能力，在博士毕业后仍需要加强学习，培养出可以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能力，由于人生学术生涯有好几十年，当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一定的学术积淀之后，进而再去做一些政策性问题研究也不会太晚。